

世外桃源與現實人生

—並敬答魏子雲先生

何懷碩

最近讀到魏子雲先生的大文「閒話陶淵明的桃花源——寄何懷碩」（發表于去年十二月號「書評書目」）。魏先生此文寫於去年八月卅一日，正是我離開臺北之後四天。對於這篇討論的公開信，延至半年後的今日才得拜讀，稽遲致答，實在不是出於怠忽，想能得到魏先生的原諒。我因不慣於以書信體文字討論問題，亦恕不踵武。

從魏先生的「閒話陶淵明的桃花源」大文中（以下簡稱「閒話」），引發我要提出來討論的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問題：一是「文學與政治」；一是「舊題材的再創造」。此外，魏先生對於拙文的批評，我想表示我不同的意見。為行文的方便，先答魏先生，再討論前面兩個問題。

一、我對魏先生批評的意見

「閒話」一文提及拙著「苦澀的美感」一書中「桃花源辯」與「矯情的武陵人」兩篇文字。魏先生不是整

體地將拙文予以分析，再下結論，而是拈出其中三數個觀念，作局部性的批評，提出了魏先生不同於筆者的看法。批評的着眼點在於批評對象的「整體」或者「局部」，原都不是問題所在。重要的是對割裂開來的某些「局部」，務必照顧其意思的完整，還須細察原文語句的含意。這個道理原極基本，不要說有多年研究、著述與國文教學經驗的魏先生，連一般人亦必大都不至忽略的。但是，很令我驚奇而遺憾的，魏先生在「閒話」中不止一次地忽略了，以致犯了通常所謂「斷章取義」的毛病；亦沒能做到細察文意。——我想這亦許就是「書信體」的論述文很不容易做到極嚴謹的缺點吧。

「閒話」中說：「您認為『陶淵明的桃花源記，簡單說便是一個有天下之心的讀書人的政治理想在文學中的反映。』這句話是可圈可點的結論。不過，要說陶淵明所記的那『桃花源』的世界，含有『政治理想』，恐未必是陶淵明寫作『桃花源』的心意。」接着，在下文魏先生又說：

「詩與記都已說明如何才能尋得他所理想中的『桃花源』，據以躲避亂世。他何嘗有『政治』的『理想』？正因為陶淵明的『桃花源』，並不是陶淵明的『政治理想』，自也無從與『理想』或『烏托邦』相提並論。」

由上引二段，可明顯的看出魏先生是把拙文原句「政治理想在文學中的反映」，截取「政治理想」四字，忽略了「在文學中的反映」幾個字。以致形成斷章取義。如果魏先生細察拙文文意，以及考慮一個觀念的整體意義，當知說「桃花源記是陶淵明的政治理想在文學上的反映」與說「桃花源記是陶淵明的政治理想」是不相同的二個層次，起碼得說是有一段距離的。因為「政治理想」比較具體，而「政治理想在文學上的反映」就不同了。任何思想在文學上的反映，亦可有「隱」與「顯」等不同層次。說某一文學反映了某一政治理想，並不等於說某作家有了具體的政治理想的主張，更絕不等於說該作家必定有了更具體的「政治策略」。而大凡古今中外詩歌文學，若表現了對人間的不平的批判，嚮往一個理想的境界，或歌頌某一理想的社會，無不或隱或顯地反映了作者對政治的看法與所懷抱的政治理想。我在「桃花源辯」中說到「桃花源永是一個理想，一種渴望

，一個人類社會奮鬥的目標」，魏先生對「一個人類社會奮鬥的目標」一語不表同意，是「因為『人類社會的奮鬥目標』怎會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呢？怎會是一處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呢？」。我覺得魏先生儘管可以說陶淵明這個目標並不具體，並不完善；亦儘管可以說無政府主義不是人類最好的政治主張，但當無法否認，這些都是古今中外哲人與文人所懷抱過的政治理想的！所謂「無政府主義」（Anarchism，舊譯安那其主義）正是政治上虛無論者的一種「政治理想」。有名的代表者如法國的蒲魯東（Proudon），俄國的克魯泡特金（Kropotkin），他們所主張的都是自己以為找到人類社會奮鬥的目標的。不久前在大陸還遭受清算鬥爭的中國名小說家，著「家」、「春」、「秋」的巴金，正是反映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文學家。至於「老子」「小國寡民」的理論，正就是「一處與世隔絕的小天地」。作為老子的政治理想，作為老子認為可為「人類社會奮鬥的目標」，苟不論我們的看法是否同意，我們又何能否定它是一政治理想的事實？而無政府主義與老子的以及其他的政治理想，在古今中外文學中，或隱或顯地被反映着，表現着，更是不勝枚舉的事實。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他的政治理想在文學上的反映（私見以為從桃花源記中「雞犬相聞」等語，說它受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的影響，實已彰然若揭。魏先生說儒家「天下有道則現，無道則隱」，「只是避無道之亂於一時。在明和之世，則不可忘君臣之義」等語，衡之桃花源記，我以為其牽強處，或更難以自圓其說。說桃花源記之政治理想，較近於道家，大概更為可信。）一語，實在並非無的放矢，亦未失之誇大。蕭望卿在「陶淵明批評」（開明書店出版）一書中說到宋以前一向把陶淵明看作「逸鶴任風，閒鷗忘海」，忽略了他憂時念亂，熱腸俠氣的一面。我們可知陶淵明不是一位純情耽美的自了漢，而且有其正視現實、關懷黎庶、復興社稷的壯懷猛志。及至看到無法挽狂瀾於既倒，才決定「賢者避其世」（桃花源詩），表面上淡然若忘於世，骨子裏對現實人生却是熱血衷腸，故陶淵明有其隱痛在。而鄭振鐸在「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」中說陶淵明「不僅是一位田園詩人，激頭激尾的詩人，而且是偉大的政治理想家」（見香港版該書二二九頁），雖然失之過份，但陶淵明之有其政治理想，文學史上早有定論。說「桃花源記」為陶淵明的政治理想在文學上的反映，桃花源記與「理想國」、「烏托邦」

相似，正說明了桃花源是一個避秦（泛指暴政）的夢境。而逃避暴政，能說沒有起碼的政治認識以及政治要求與嚮往麼？

其次，魏先生在「閒話」一文中說：

「你不同意『桃花源記』是一篇『獨立性的作品』。這一點似乎無法令多數人同意。」

魏先生的這一段話，我很贊成。問題是魏先生引用拙文句子，又是斷章取義，與拙文原意大不相同。拙文原文是：

「說陶淵明的『桃花源記』是『一篇獨立性的作品——小說』，從何說起呢！分明是一篇記事體的散文（在中國文學中或稱古文），雖然是幻想的作品，但假借記事的體裁，如何稱之為『小說』？」（見『苦澀的美感』二九二頁，原文於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版。）

我寫「桃花源辯」之前，當時人間版刊出好幾篇涉及「桃花源」的文字，有的是用來為「武陵人」捧場的。我的「桃花源辯」正針對當時情況，提出了我的看法。但不想引起過多的爭論，故我採取的態度已在文中表明：「我只略說我個人的理解，故偶涉批評亦不擬提及姓名，但對於質疑者，自應有答覆。」

當時有某君在「人間版」說「桃花源記」是「一篇獨立性的作品——小說」，我表示置疑，魏先生漏看「小說」二字，差之二字，謬以千里，讀者一查拙著原文可知，此不須辭費。湊巧的是，如果說「桃花源記」原來並非單純是一篇獨立性作品，亦不能說完全錯誤。因為「桃花源記」本來是陶淵明「桃花源詩」的「并記」（可以看作是「序」也）。清朝沈德潛編選的「古詩源」中就是這樣排印的。至如「古文觀止」之類把「桃花源記」獨立存在，固然如魏先生所說：「早成事實，甚而祇知有記不知有詩的人甚多，這就是一個明證。」但是拿來作為「桃花源記」是一篇獨立性的作品的「明證」，似乎不如說「桃花源記」本身自成完整結構，大可離詩而獨立為妥當吧！（魏先生又說：「想必您也忘了『記』以外還有『詩』吧？」我想喜讀陶詩的人，大概不會漏掉「桃花源詩」的。）

說「桃花源記」是一篇獨立性的作品，可無疑問，但說它是一篇「小說」，我頗不能理解，而且表示懷疑。正如魏先生所說「小說與散文的分野，不易劃分，然小說應以人物為主」。而且，自來中國小說起源問題，似亦未有定論。有的以為唐代始有小說（如周豫才、胡懷琛），有的以為應從魏晉開始（如劉大杰、柳無忌）。近有人把孟子離婁篇下的「齊人」一章深入分析，認為中國小說早於戰國時代已有之。（見明報月刊一〇九期黃維樑「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」）我想這個問題都還待專家們去尋求定論。但從許多文學史名著中，尚不曾見有人把「桃花源記」定為「小說」類。多數是作為「散文」看待的。如果要堅持「桃花源記」是一篇小說，先得推翻所有文學史的說法提出充份的證據。魏先生「閒話」中三言兩語，似不能得出那樣肯定的結論來的。而若照魏先生「小說應以人物為主；塑造出人物生命形體的文學作品，舍劇本而外，自應屬於小說」這樣簡單籠統的「定義」來劃分，則「小說與散文的分野」，就不是「不易劃分」，簡直是「不必劃分」了。

再次，魏先生說：

「說到張曉風的『武陵人』，我認為您寫的『矯情的武陵人』，也同樣地『矯情』。」魏先生說出理由有二：「第一，您認為『武陵人』誤解了『桃花源』，這豈不是矯情地非要『武陵人』去詮釋『桃花源』不可嗎？」；「第二，您認為『武陵人』劇中所標示的『天國』，只能屬於宗教的天國。這一點看法，與我不同。」我不懂得魏先生對「矯情」一詞如何解釋。照魏先生提出的兩點理由來看，對我那篇批評文字的批評，似應說是「霸道」，怎麼可能說是「矯情」的呢？（對於「武陵人」曲解「桃花源記」的分析，在拙文已很詳細有所論述。而曲解是否是「再創造」？至於「舊題材的再創造」，容後文再說。）我以一萬字分析「武陵人」劇本，結論之要是「矯情」；魏先生幾句話，就輕易把同樣結論加給我那篇文字，似乎不甚「慎思明辨」。而魏先生「閒話」一文的文末，赫然有此一句：

「……這一點，留待下次我尋到『武陵人』劇本時，再進一步與您作長談。」

我不知道魏先生是否只憑兩次「觀賞」武陵人演出，根本沒有讀過「武陵人」劇本，就對拙作「矯情的武

陵人」遽作批評（我不敢斷言說「想必魏先生對『武陵人』只知有『演出』，不知有演出所依據的『劇本』」，起碼我們知道當魏先生着手寫這篇涉及對拙文「矯情的武陵人」的批評文字——「閒話陶淵明的桃花源」——之時手頭並無「武陵人」劇本。這就未免失之草率不負責任，令人感到頗為遺憾，而且吃驚！

陶淵明的「桃花源記」與「詩」所描寫的人間樂土，實已完美到不可企及，只能成為夢想，只能成為一個最高理想、一種渴望。但是，這個夢想與渴望，却不是仙山樓閣，而有其健康、質樸的現實意義。（記與詩中有：阡陌交通、雞犬相聞，往來種作，設酒殺鷄作食；相命肆農耕，日入從所憩，俎豆有古法，衣裳無新製，童孺縱歌行，斑白歡遊詣，草榮識節和，木衰知風厲等句）說實在話，這樣一個須勞作、有榮衰、有生老、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樸素理想，本不須「騷輕風」到「塵囂外」去尋找的，它只是一個「秋熟靡王稅」的較合理的人間社會而已。而陶淵明還須質問方外遊士，何處去尋找這樣的桃源，只更見出陶淵明對現實的痛切失望！這樣的一個理想社會，雖然沒有「高」到神仙生活無生死、無饑寒、免勞作的「超現實」境界，但陶淵明之偉大，正因他是正視現實人生，不是沉迷在玄談幻夢中的仙客術士。如果把「桃花源記」當作材料來再創作，而把「桃花源」作為一個令人靈魂麻木的低劣的歡樂所在，則應把「桃花源」在「改編」中描寫為一個酒肉徵逐、醉生夢死、一切不必付出勞作的代價的懶人的「安樂窩」。若果如此，拿「桃花源記」的題材來肆意歪曲，則距「再創造」又太遠了。而既沿襲了「桃花源記」所描寫的「桃花源」的內容，又否認它的價值，則應自信能提出比「桃花源」更崇高的理想來，方有「再創造」的意義在。如果任意曲解「桃花源」的本質，而假借「再創造」的名義，以為不必「斤斤於是否符合原作」，則妄貶古人，糟蹋遺產，都是「再創造」的手段？我想，魏先生必不會同意的。

魏先生多年來著作豐美，文學研究造詣甚高，一向為我敬佩。這一篇「閒話」，或因匆匆執筆，故欠周密。但既發表出來，我願提出如上誠意諍言。我的「唐突」，亦希望能得到魏先生的諒解。